

的代表作《财政学新论》。无论是这次谈话，还是《财政学新论》，都坚持了他的一贯的学术观点。王绍飞同志在学术上是赞同已故孙冶方同志的“财政学的核心是研究M”的观点的。他认为，财政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分配剩余产品的经济形式，国民收入中的剩余产品是财政分配的对象，是财政分配的规定性。他以“M”为财政的分配范围，建立起新的财政学体系，自成一个学术流派。他在《财政学新论》一书中，从财政关系的起源和发展写起，阐述了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论述了财政收支的数量界限、经济内容，提出了财政效果和财政发展的战略目标等问题。这本书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尽管有些观点在财政学界是有分歧的，但这本书对推动财政学界的学术研究，开展百家争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早就听说，王绍飞同志是一位由农民到战士到财政学家的共产党员。少年时当过儿童团长，他的党龄比工龄还长。解放战争时期，在老家山西灵丘县四区当过武装部教导员和大阳丰六区副区长。解放后，担任过察哈尔省税务局调研股长，195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预算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从事财政学的研究工作。他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同他的刻苦勤奋、勇于探索以及严肃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早在六十年代初，他就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剩余劳动与剩余产品理论为基础，研究建立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的财政学观点与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

利润指标》一起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他成了“孙冶方一伙”的重要分子。粉碎“四人帮”以后，正当他想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书的时候，不幸又患了癌症，1979年作了胸腔手术。这些祸难没有动摇他向科学进军的信念，没有改变他思考学术问题的习惯。他在病榻上打腹稿，在疗养中握笔疾书，二十多万字的《财政学新论》就是这样脱稿的。

“对我来说，不能工作是最大的痛苦，我要‘垂死挣扎’，向生命索取科学成果！”王绍飞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访问时，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刘溶沧和副研究员杜萌崑同志在座，他们告诉笔者，王绍飞同志在最近几年，强忍着病痛，刻苦地研究财政金融方面的基础理论和结合现实工作的理论问题。他一天几百字几百字地写呀，写呀……已写出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40篇，约25万字。他以使人难以想象的旺盛精力，主持研究室的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他和所内同志合编的《财贸经济部门发展战略》一书即将出版，现在正组织人力编写国家预算、国家税收、社会主义资金使用效果以及财政体制等四部书。他还亲自带着两个研究生和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

当我整理这篇访问记时，耳边又响起了访问那天刘溶沧同志讲过的几句话：“绍飞同志在科研道路上既有那么一股子刻苦耐劳、坚初不拔的精神；又有那么一股子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敢于冲锋陷阵的气势，他实在不象一个癌症缠身的人。”是呀，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也是值得学习的。让我们用这样的精神去开拓新的财政科研领域，去开创财政工作的新局面吧！



妮妮一席话

节约五千元

元宵佳节，传统盛会，翔县财政局给文化局拨出一笔款子，作为庆贺活动的经费。这件事却引起财政局农财股长刘兰英的一番思虑……

夜半钟声，刘兰英辗转反侧，终于向丈夫，县文化局长雷云贵把自己的心思和盘托出：“偌大一个县，花点钱庆贺元宵佳节，也算小事一桩，更何况我们是工农业总产值双翻番的县。但目前国家财政较困难，县机动财力有限，我们应该处处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你若大笔一挥，就能把拨的钱都花出去，可你不要忘记财税干部走农村，下厂矿，风里来，雨里去，征收国税，积累资金的艰难啊！刘兰英的一席话，使老雷深有感触，面对朝夕相处、在财税战线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妻子不禁肃然起敬。感动之余，他脑海里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在欢庆元宵佳节结束的那一天，雷局长高兴地向妻子说：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该花的尽量少花，不该花的一分也没有多花，最后为国家节约了五千元，红火的气氛也一点没有减少。兰英听了，满意地笑了。

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无不称道。

中共山西翔县委员会 王国相 贾鸿琳 李涌